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 「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

林時民\*\*

### 提 要

中國史學自史公司馬遷揭櫫「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後，後世學者多奉為圭臬，執行如儀，乏人逾越。史公此句名言，遂衍為史學要則，成為重要傳統遺產之一。

本文除探究史公如何在其「一家之言」的《史記》中，達成其欲臻於「通古今之變」的理想外，更就史公以降歷代具代表性的史家劉知幾、杜佑、司馬光、鄭樵、章學誠諸氏，析述其人其書之旨要，則不僅可以發現縱面上由漢代迄於近代一貫相承的「通變」思想，縷縷不絕；亦可審知橫面上各人成就名目雖殊，或在紀傳體通史、史學批評理論、典制體通史、編年體通史等不同領域上，樹立風聲，揚名萬世，唯根本的通變之道，實皆源於史公的「通古今之變」。是知，今日吾人治史，恐亦不能自外於此則指導思想。

**關鍵詞：**通古今之變 通變 會通 傳統

---

\* 拙稿荷承兩位秘密審查先生惠賜卓見，謹此申謝。

\*\* 本文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研究歷史主要有三大目標：求通、明變、評斷。評斷要基於求通、明變的礎石上，才能準確、客觀、精當、高瞻。三者互有關聯，關係密切。而求通、明變是治史要務，則是大家耳熟能詳之事，蓋史公司馬遷久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三句名言，不僅是史公想要達到這個目標，也引發後世史家都以上句金言，為終身鵠的，永遠追求。即使不佞如筆者，雖知才薄無以致之，亦願如追夢一般，永不輕言放棄。

史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都藉其「一家之言」來落實與兌現。「究天人之際」的職責，在漢宣帝之後，已專由太史令職司其事，史官轉而僅負責言事的記載。<sup>1</sup>然就史學發展而言，「通古今之變」反較「究天人之際」為後世所相對看重，致而其意義更為突出和重要。素來專學史公「通古今之變」的學者，不乏其人，有成就者亦大有人在，<sup>2</sup>不需在此重提。「通古今之變」既為治史要務，後世史家又多奉為圭臬，則其義雖由史公所創肇，傳衍迄今，已是一優良史學傳統。故而本文擬首先針對史公如何在《史記》之中，具體落實其「通古今之變」來加以析述，之後再就其影響與傳承，展衍與變化略加著墨。筆者以為如此取徑（approach）或比單從史公上句名言本身更能驗證其古今之通達，自無必要只侷限在史公一人而已。因而本文題目並未冠加史公或司馬遷專屬的「通古今之變」，道理即在於此。以下先論史公，之後再循時代先後，略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家，如之何一如史公落實其理念於其代表作之上。若能略加申明其中大意，則本文目的已達。由此，吾人也更能明瞭「通古今之變」的重要性之一斑。

## 二、司馬遷

---

<sup>1</sup> 《史通通釋·史官建置》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307。

<sup>2</sup> 阮芝生（資姓），〈試論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原載《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後又收於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 185-223。即是名作之一，其他尚多，不細舉。

〈報任安書〉上史公有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意即要透過撰述《史記》來對古往今來的歷史變化做一系統的總括，故其撰作，「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sup>3</sup>貫通古今；內容上則人事、天文、地理無所不包，展現橫通廣博的一面。方法上，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sup>4</sup>而達到他對上古迄於漢武歷史變化的考察。

就「通古今之變」這句名言本身來說，「通」既有時間先後數千年縱面的貫通、直通，也有橫切面上地理、天文、曆象、人事、國度上的交通、旁通。其古今交錯，縱橫經緯的史事發展，內含變與不變的分歧與爭論，不變者即為長遠的傳承，變者卻是無時不刻的存在。兩者交構，歷史的錯綜複雜性與過去具體性，皆躍然於紙上。歷史或社會變了什麼？怎麼變？往哪裏變？是否應該變還是不變？……都是應該探索、了解的。

史公提出此句，即看到了歷史「變」的特質，歷史始終都處在變的過程之中。他說過：「天人之際，承敝通變」、「略協古今之變」、「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sup>5</sup>又說：「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sup>6</sup>史公常用「變」、「漸」或「始終」來形容變化，這點李長之、阮芝生、許凌雲都已指出。<sup>7</sup>「變」指事物的不斷進化和發展，「漸」指進化和發展的過程，「終始」指事物發展過程中因果之間的關係，涵意不盡相同，但總在說明事物在變。史公認為歷史的變化總是由「漸」至「變」，舉秦為例，秦由原西方偏遠小國，歷經（秦）襄公護衛（周）平王東遷，始封諸侯，文公營歧、雍，穆公修伯政，獻公雄諸侯，孝公變成法，凡百有餘年，逐漸變為爭霸稱雄的強國，最後則在始皇時期統一六國，併吞天下。吾人參讀《史記·秦本紀》或〈秦始皇本紀〉，即知此事乃長期發

<sup>3</sup> 《史記·太史公自序》（台北：鼎文書局，1986三版），頁3321。

<sup>4</sup> 《史記·太史公自序》，頁3319。

<sup>5</sup> 《史記·太史公自序》，頁3298。

<sup>6</sup> 《史記·平準書》，頁1442。

<sup>7</sup> 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台北：開明書店，1976台九版），頁234-235；阮芝生，〈試論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頁190；許凌雲，《司馬遷評傳》（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頁123。

展變化的結果，是由「漸」到「變」的過程，有其始亦有其終。

「通古今之變」即是要清楚歷史發展的「終始之變」，也就是弄清楚其因果關係，用史公的話即「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探尋歷史的發展及其規律性。史公認為歷史發展有某種必然性，如〈平準書〉所言：「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也有某種規律性，如「承敝易變」或「承敝通變」即是，這些都是史公歷史變化觀的集中體現，也是《史記》之所以會「成一家之言」的重要保證。史公用百三十篇，526,500 餘字，寫三千年史事，即欲由紛雜史事，尋出其發展規律，故他於書中展現三種方式：

(一) 原始察終：即追原其始，察究其終，把握歷史演變的全部過程，找出其間的因果關係。即實質上對歷史現象的條件、背景、作用、影響、發展、變化等各種情況各種因素都予以全面的分析和考察，找出「因」到「果」之間的參照點，即找到邏輯的起點，以至於終點及過程中辯證的發展。簡單講，就是史家對歷史現象要予以解釋，卡爾(E.H.Carr, 1892-1982)就曾說：「研究歷史就是研究原因」，「歷史是要把過去的事件整頓成爲有先後次序的因果關係」。<sup>8</sup>史公以書、表的形式，來概括他歷史的變化觀。其中特別是十表的序，最能表現。《史記》按不同情況立三種表：世表——年代不明而世系可稽者，如夏、商、周三代；年表——年序清楚的列之，如六國；月表——歷史變動巨大而月序又明白者，如秦楚之際。史公透過這三種表共十篇的創制，使數千年歷史的發展脈絡變得清晰容易掌握。如〈十二諸侯年表〉：

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sup>9</sup>

<sup>8</sup> 卡爾著，吳柱存譯，《歷史是什麼？》（北京：商務出版社，1981），頁 92-94。

<sup>9</sup>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頁 509。

僅僅數言，即將周室衰微，諸侯擅政，四國更霸，其間（841-477B.C）凡 365 年間之政治形勢演變敘盡。又〈六國年表〉載 476-203B.C，凡 270 年間之事，欲觀秦併天下之迹，讀此表可盡其史事。接著〈秦楚之際月表〉載 209-201B.C 凡 8 年史事之重大變化者。史公皆藉此原始察終，歸因分析史事的發展變化。

（二）見盛觀衰：指事物發展到極盛時，要看到其衰象，並注意到歷史的轉變。史公寫史，高妙處即在於能於升平盛世之中，看到史事的核心本質，探查盛衰的關係。這個道理猶比福兮禍所倚，日中則昃的《易》理是相同的。史公述評孝武之盛，能「外攘夷狄，內興功業」但「盜賊寢多」的危機其實已內藏其中。〈平準書〉中先寫西漢繁榮盛景，如「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sup>10</sup>這樣一幅盛世圖象。然而，史公隨即筆鋒一轉，寫道：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sup>11</sup>

之後，又寫賣官鬻爵，官民爭利，則似是由盛轉衰之徵兆了。史公將歷史過程看成一個變動的，具有盛衰波動的過程，這是史公盛中觀衰的歷史價值，體現其「通變」的觀點。<sup>12</sup>

（三）承敝通變：指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然產生弊端，此後則將發生變化，有一種歷史必變的思想。《史記》裏寫了不少變革，如湯武之變，他寫：「湯武承敝易變，使民不倦，各競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即說商湯、周武承前朝弊政之後，有所改易，使百姓不致疲弊困乏，各自小心謹慎致力於自己所從事的

<sup>10</sup> 《史記·平準書》，頁 1420。

<sup>11</sup> 《史記·平準書》，頁 1420。

<sup>12</sup> 王銀春，《人類重要史學命題》（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14。

事業，而與禹時相比，已稍有緩慢衰落之象了。其他尚有管仲改革，李悝、吳起、商鞅變法，都是承敝易變，因敝而變。史公寫秦漢之際，在《高祖本紀》的論贊中說：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sup>13</sup>

秦始皇之前已經「久敝」了，始皇當政，未能去弊從善，順應潮流採取變革措施，反而「反酷刑法」，結果「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物盛則衰是歷史變化的規律，見盛觀衰，正視衰敝，且承敝通變，則能起衰振弊，長治久安。史公述三代之變、秦漢之變等等，都是「通古今之變」發展的成果，古往今來的歷史都存在著盛衰終始之變。「敝」是歷史前提，有「敝」則「變」，變則通，而得天統矣。

以上三方面即史公「通古今之變」的要則與門道，由之則可通達古今之變，用之於指導現實，則可具有巨大的現實功用。史公通貫了三千年史事的變化，歷史發展的原則他得出使民不倦，以禮義防于利才是最重要的結論，此項看法是史公觀察到周衰以後，禮樂崩壞，孔子出而刪六藝作《春秋》，欲以撥亂反正。然孔子之道不行，歷經戰國以迄於秦漢，皆蔑禮尚法以爭利，漢初因秦不改，至於武帝，漢興且近百年，本當接三代統業，觀三代損益而重新制作一代之大法，然武帝名為興禮重儒，其實卻專飾鐘鼓玉帛以欺世，其嚴刑嗜利反甚於漢初四世，而古代禮樂自此遂不復可見。史公痛武帝失去此一千載良機，以多欲侈心敗壞前代休養生息之社會生機，深懼蹈秦覆轍，不知通變。故撰《太史公書》百卅篇，從通古今之變中欲達致治之原，最後則寄望於後人，「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要之，其通古今之變亦在歸本《春秋》，行仁義而已。史公其言，「明為百王大法」，其實「非一代良史而已」。<sup>14</sup>通古今之變的現實意義，旨在斯哉。

<sup>13</sup> 《史記·高祖本紀》，頁 394。

<sup>14</sup> 包世臣所言，引自阮芝生，〈試論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頁 217。

### 三、劉知幾

劉知幾（661-721）著作《史通》，在〈自敘〉篇陳述其書受到《論衡》、《風俗通》、《人物志》、《文心雕龍》、《法言》、《典語》的影響，這些書無一不在治學精神上從「通」字上下工夫。<sup>15</sup>劉知幾受到影響，除著作《史通》內容講究「通」外，甚至連書名也取「通」，可見劉氏之重「通」。<sup>16</sup>

《史通》之所以成書，是因當時的史官著述，義例不純，所以才要「辨其指歸，殫其體統」辨清編寫史書的宗旨，並窮盡其體裁綱統。而且「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sup>17</sup>如果《史通》僅就當時史官不明史學之體統與指歸，只寫出涉及史書編纂方法理論典則的《史通》，則立論似並不宏大，然而尚有「餘波所及」，該書尚要「上窮王道，下揆人倫」，則使得該書格局放大許多。從「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的「王道／人倫」，劉知幾是以「上／下」來聯繫貫通的，上下之間，即是王道人倫的關係，也就是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係，這是古來史家史官所最關切的命題。史公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名言，其實也是「天／人」、「古／今」的上下關係，這點劉知幾可能也受到某種程度的啓發。何以言之？劉知幾在《史通》的〈六家〉、〈二體〉寫到《史記》之處，都由《史記》之「通」字上著眼來推許史公的。

連史公著述《史記》是歸本於《春秋》（詳上文），劉知幾撰《史通》亦追源於《春秋》，他自認可以「出手眼釐定群史，志擬《春秋》」，<sup>18</sup>他甚至引孔子所說知我、罪我皆《春秋》之語而自比其書，大有「知我者《史通》，罪我者《史通》」之慨。上追《春秋》，是古來史家的共同願望，不僅史公、劉公如此，後來的歐陽

<sup>15</sup> 《史通通釋·自敘》，頁 291。

<sup>16</sup> 《史通·原序》：「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採眾議，爰定茲名。」

<sup>17</sup> 《史通通釋·自敘》，頁 291-292。

<sup>18</sup> 詳《史通釋評·自敘》（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 334-335。此處用浦起龍按語。

修、章學誠亦莫不如此。只是本文茲處特別強調劉知幾史學歸源《春秋》，若干程度上係受史公所啓引的。

史公成《史記》，綜述數千年史事而自成一家之言，在劉知幾官修史館制度之下變成一種不可能實現的願望，他原本是要刪定史公以下的史書，上繼孔子成不刊之典的，來達成其所要求之「通」——通識的。但在美志不能得遂之下，不得不退而只寫《史通》，從一代國典改而侷限在對古今史書的評論之上。在方式上，他採取了與史公不同的路線；但在追求會通人類歷史的目的上，兩人則沒有不同。總之，劉知幾繼承前人的優良傳統並發揚光大之。反映在《史通》裏，其史學思想的最基本點，就是以錯綜經緯、貫通古今的「通識」觀點，去分析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利弊與真偽，以「辨其指歸，殫其體統」，並且內容所波及影響到範圍，往上窮盡王道，往下展述人倫，總括包容萬千不同的各種社會現象，真是橫通縱通都包含在內了。《史通》的學術氣象不僅確立，亦且鑄就其一家獨斷之言了。

更具體來說，劉知幾繼承了史公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和方法，其《史通》49 篇內容幾乎無一例外地貫穿通古今之變的思想，運用「原始察終」敘述事物的始終，大至討論整個史學發展的面貌，小至辨章一種史書體例。以首篇〈六家〉而論，他把唐代以前的史書體例作一總結並視為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從「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歸納為六個流派，並針對此六個流派分別敘述其始、終的過程，最後作出結論：「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他用縱向的歷史主義的方法，于考鏡源流中辨別史書的體裁。

《史通》外篇有〈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兩專篇，有系統地考察了自古迄唐的史官、史館兩種制度的沿革廢置，也有系統地敘述了歷代編年、紀傳兩種體裁史書的編纂過程和因緣關係。還有一篇〈雜述〉專門敘述十種史流雜著。〈史官建置〉可以說是一部簡約有統的修史制度史；〈古今正史〉述正史的演變，也可說是一部簡略的史學學術史。〈雜述〉則分析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十種，一一析其特點、價值、流別及演變，此三篇都相當扼要地勾畫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線索，從古敘至皇朝當今。也就是此三篇亦是「通古今之變」「原始察終」的運用佳例，尤其從古一直敘述到劉知幾寫《史通》的「今上」（中宗），更與史公從黃帝敘至孝武今上是同一路線，劉知

幾受史公影響的痕跡是可以明確感受到的。

《史通》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諸篇有關紀傳體史書五體的評論，也都能從歷史的敘述中，判斷其體例的性質與得失，如〈表曆〉篇首述表之起源及格式，繼而考評史公之表、班固之表及魏晉南北朝之表，並評論《漢書·古今人表》之失。再如〈論贊〉篇，從「《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議，劉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不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sup>19</sup>亦是由古至近的縱深方法。至如〈序例〉、〈題目〉、〈斷限〉、〈編次〉、〈載文〉以迄〈辨職〉第三十五等等都是採用這種方法。劉知幾都以各個領域各個專題從古至今的發展演變論述起，再加以分析、評論，故其史論都有歷史表述的特性，其長處正是通變方法的具體體現。

劉知幾以「原始察終」的觀點和方法來考察歷史或史學，例子極多，茲舉一、二例以概括之，以證所言無虛。如〈忤時〉篇：「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躋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疑古〉篇有云：「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惑經〉篇亦云：「考茲眾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等等，可見劉知幾熟用此法，並把史學發展史看作是一個有終始的演變過程，由古迄今（指唐朝當代）。當然，這個「終始」的過程，如同前面所述，裏頭已寓有「變」的觀點了，這點就不需要在此重述了。

## 四、杜佑

杜佑（字君卿，734-812），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出身望族，青年時代以門蔭入仕，歷任京官、外官，做到嶺南、淮南節度使，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多年掌管財政。是唐代中葉的重要政治家、理財家和史學家。

他目睹開元、天寶盛世，親歷安史之亂。他數十年間的仕途生涯，正是唐朝

---

<sup>19</sup> 《史通通釋·論贊》，頁81。

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他從縣丞做到宰相，熟悉政治上的得失，尤其長期判度支，掌管錢穀鹽鐵，了解財政上的利弊，其豐富的政治閱歷，對著作《通典》一書大有助益。他「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sup>20</sup>每思對現實政治有所變革。唐憲宗說他「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要」，<sup>21</sup>由於他「不好章句之學」<sup>22</sup>「知歷代沿革之要」，「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因而《通典》即是在經邦致用的思想指導下，總結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研究，企圖挽救中晚唐的危機而編纂的，這是杜佑透過典制史的「通古今之變」，為晚唐之世開出的治世良方，此即其著述宗旨。

杜佑其書前承劉知幾之子劉秩所著《政典》的啟發，「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sup>23</sup>《通典》的編纂，大致在代宗大曆年間，杜佑做淮南節度使從事時，即已著手編纂，至德宗貞元十七年，任淮南節度使時，才大功告成，獻給朝廷。他在〈進《通典》表〉中說：「自頃纂修，年涉三紀。」其著作年限大致在 766-801，歷時卅六年之久，符合其所謂「三紀」之久，可見他為編纂此書，耗費了近半生的心力。

《通典》全書共二百卷，上起黃帝，下至唐玄宗天寶末年的歷代典制沿革，肅、代宗以後的變革則多以夾注補入。全書分為九典，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典又分若干門。此九典的安排次序，反映其史識觀點。其以〈食貨〉、〈選舉〉、〈職官〉置於前述，乃杜氏以為國家經濟措施、選舉制度、政府機構三者至關重要；禮樂是維護統治的軟手段，兵、刑是維護統治的硬手段，不可或缺，所以居於中；而全國的行政畫分及四方鄰國，又皆關繫國家的穩定和安全，所以州郡、邊防殿於後。他以此九個門類結合成一個完整體系，而把食貨、選舉放在首要位置，一般皆以為是其卓識的顯現。杜佑在這九個門類當中，對每一制度的敘述都採貫通古今之法，明其沿革廢置，按時代順序排列資料，既擇要著錄有關制度的大事記、奏疏、詔、制等，又引錄前人有關的評論，並提出自己的見解與主張。這種寫法，是對正史「書志」的發展，紀傳體正史的

<sup>20</sup> 《舊唐書·杜佑傳》（台北：鼎文出版社，1979），頁 3982。

<sup>21</sup> 《舊唐書·本傳》，頁 3981。

<sup>22</sup> 《通典·自序》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

<sup>23</sup> 《舊唐書·杜佑本傳》，頁 3982。

志，本有其局限性：「苟不追敘前代，則原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有闕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sup>24</sup>《通典》的出現，便彌補了史志的局限當代、原委不明的缺點。它讓讀者看清典章制度的來龍去脈、歷代沿革。<sup>25</sup>至於書中記述唐代制度，則多係作者親見耳聞，尤為詳盡，價值更高。

杜佑取材歷代正史書志，但都經過其本人嚴格甄選，大致與政治直接關係不大的〈五行〉、〈釋老〉，都擱而不錄，由之可見其編纂用心。且其記載典章制度，每每援引前人具有參考價值之言論，分標之「說曰」、「議曰」、「評曰」。其中的分別，杜佑自己有說明：「凡義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云『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明者，則議之，皆云『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云『評曰』。他皆同此。」<sup>26</sup>這些序、說、議、評，都是杜佑的重要見解，今日已成探討杜佑思想的重要史料了。

杜佑《通典》的編泐勒成，意義重大，它是史學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史的出現，意味著編年、紀傳二體之外，又創立了一種新的史體——典制體或政書體。他第一次系統地對歷代典章制度進行整理，探本求源，開闢了歷史研究的新領域。影響了鄭樵《通志廿略》及馬貴與《文獻通考》的問世，甚至更浸有「十通」的出現，形成典制史一系列的叢書，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留下重要的影響。<sup>27</sup>當然，本文這裏所要強調的還是杜佑的經邦治國思想，是歷代上起軒轅，下迄當朝肅、代的典制沿革，通論各代，兼顧九類，興革廢置而得。易言之，即杜佑乃由典制史的方面去「通古今之變」而獲取成果的。

## 五、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1019-1086）和其重要助手劉恕（1032-1078）、劉攽

<sup>24</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出版社，1984），頁65。

<sup>25</sup> 王文錦，《通典·點校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2-3。

<sup>26</sup> 《通典》卷42，頁1167。

<sup>27</sup> 王文錦以為《通典》受到當時和後世的重視，大致可以歸結為六點：宗旨明確、體系完整、體裁更新、議論切實、資料豐富、編排得當。見〈點校前言〉，頁5。

(1023-1089)、范祖禹(1041-1098)等人根據大量的史料，花了十九年的時間，始將戰國迄於五代(403B.C.-A.D.959)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編寫成年經事緯的巨著。是書本名《通志》，神宗皇帝以其書鑑于往事，述歷代君臣事蹟，有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sup>28</sup>是書之成標幟著北宋史學的最高成就，後人因之取與司馬遷相提並論，稱之為史界「兩司馬」。

溫公撰《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的旨意，在其上《通鑑》表文中有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論，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可見其編纂目的，即在提供帝王周覽，從中鑑戒得失。其用心也為英宗皇帝賞識。神宗則在〈御製資治通鑑序〉中回應：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sup>29</sup>

可謂讚賞之至。《通鑑》採編年述史，年經事緯，由周威烈王敘至五代，為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編年體裁通史。在《通鑑》之前，只有《史記》為紀傳體通史及本文前言杜佑之典制史通史體裁的《通典》而已。至於編年體，自東漢獻帝時荀悅奉敕撰《漢紀》，創編年體斷代史以後，漢唐之間皆斷代為書。唯北宋年間《通鑑》採編年體，敘 1362 年史事，是第一部貫通古今的通史，這不能不說是史學史上盛事一樁，它改變了編年體斷代為書的局面。是書既能使讀者對歷史發展的梗概一目了然，又能避免枯燥乏味的流水帳簿之弊。每逢重大歷史事件，必然交待前因後果，並扼要敘述制度沿革，幫助讀者了解歷史進程。顯然，司馬光繼承了《左

<sup>28</sup> 御製，〈資治通鑑序〉，收入《資治通鑑》(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頁 33-34。

<sup>29</sup> 《資治通鑑·御製資治通鑑序》第一冊，頁 33。

傳》的優良傳統，且有所發展。<sup>30</sup>此後，南宋鄭樵的《通志》，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均為史學上的鴻篇巨制，促進了通史體裁的勃興。

《通鑑》的編纂，集私撰、官修之長，既發揮了集體修書的優越性，又克服了設館修史的弊端，是古代集體撰史的典範，至今仍有學習效法的意義。唯溫公在《通鑑》之中把史學資治、借鑑的意義，發揮至大，他作《通鑑》是爲了「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sup>31</sup>他從興衰、得失、善惡、是非等方面來總結歷史經驗，取得甚大的成就。他在「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這一總目標的指導之下，從 1362 年長遠的史事之中，專詳治亂興衰，著重敘述歷代重大事件的發生和發展，記載歷代戰爭的謀略和經過。對於一些能夠左右時局的重要人物的事蹟和言論，對於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改革，禮樂兵刑的演化，各種族之間的往來以及社會風氣的變遷、丁口的增減、典籍的聚散、曆法的改革、水利的興修等等，也都有所記載。<sup>32</sup>可見溫公著書雖有其明確的目的，但都必須透過各方面的「通古今之變」來達成的。

## 六、鄭 樵

鄭樵（字漁仲，1104-1162）是一名布衣史家，一生獻身讀書著述，矢志不渝。三十五歲（1138），開始想寫一部繼《史記》而後貫通古今的通史，<sup>33</sup>至四十七歲（1150）他上書宰相秦檜之後，即開始撰述，迄紹興卅一年（1161）終於完成《通志》一書，凡二百卷，其書從準備到完成約費時十年左右，是鄭樵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雖鄭樵一生總共撰有八十餘種著作，但今存者唯《通志》、《爾雅鄭注》、《夾漈遺稿》、《詩辨妄》數種以及若干零散斷篇遺文而已，<sup>34</sup>因而吾人今欲研究鄭樵一

<sup>30</sup> 許凌雲，《怎樣讀史書》（台北：學海出版社，1990），頁 59-60。

<sup>31</sup>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 17。

<sup>32</sup> 參張家璠等主編，《中國史學史簡明教程》（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1992），頁 194-195。

<sup>33</sup> 可參拙撰，《史學三書新詮》（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 年）第一章〈「三書」作者的生平與其著作之關係比較〉，有較詳細之引證。

<sup>34</sup> 鄭樵一生著作不斷，據大陸廈門大學歷史系的調查統計，多達八十四種。但除少數保留下來以外，大部分的著作，如《書考》、《春秋考》、《諡法》、《石鼓文考》、《百川源委圖》、《分

生有關史學的貢獻，必須從其《通志》下手分析。<sup>35</sup>

鄭樵在《通志·總序》的開頭便說：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於諸夏，  
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

可見「會通」是《通志》一書的總主旨，也是他的開宗要明的「義」，亦即其「史義」。他又說：

自書契以來，立言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  
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sup>36</sup>

此處所謂「會」是指「總詩書禮樂，會於一手」，「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sup>37</sup>所謂「通」，是指「貫二帝三王通為一家」，「通黃帝、堯舜至秦漢之世」，<sup>38</sup>所以「會通」的實際涵義不脫離是指歷史資料的彙輯、綜合和依據年代先後次序加以排比貫通。但鄭樵意旨所在，還不止於歷史資料的問題，他說：

天下之理，不可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sup>39</sup>

可見「會通」更大的意義在於「會理通道」以求得「古今之變」。也就是說要求會

---

野記》、《詩名物志》、《食鑿》、《群書會記》、《校讎略論》、《書目正訛》、《圖書志》、《氏族源》、《集古系時錄》、《集古系地錄》等等，均已亡佚。上皆在〈上宰相書〉所錄。並可參：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樵研究小組，〈鄭樵史學初探〉，《中國史學史論集》第二冊，頁 319。

<sup>35</sup> 鄭樵原欲寫《通史》後改名為《通志》，見《夾漈遺稿·寄方禮部書》，頁 519。司馬光原欲寫《通志》，後皇帝賜名《資治通鑑》。

<sup>36</sup> 《通志略·總序》（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 1。

<sup>37</sup> 《通志略·總序》，頁 1。

<sup>38</sup> 《通志略·總序》，頁 1。

<sup>39</sup> 《夾漈遺稿·上宰相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重刊），頁 521 上。

通天下之「理」和「道」，以探求歷史的演變及其原因。<sup>40</sup>他在〈上宰相書〉中還談到：

仲尼之為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為一，舉而推之，上通於堯舜，旁通於秦魯，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sup>41</sup>

可知其「會通」即淵源於孔子之為《春秋》。不僅止於孔子，其「會通」史觀與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也有直接關係，他曾說：

水不會於海，則為濫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論會通之義，以為宋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sup>42</sup>

再次可見「會通」是鄭樵修書的指導思想，是其修史的第一原則。鄭樵以「貫通古今」為目標，以「相因依」之義互相聯繫來看待整個歷史，時間上指的是從古到今的整個歷史發展，空間上指的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史。此觀念落實到實踐層次時，即綜合古代各種書籍而修成包羅萬象的著作，「集天下之書為一書」了。鄭樵的學術氣象因而變成宏大可觀。

既然鄭樵撰就《通志》在於「會通」的一貫原則，也就是要歷史有縱向（貫通）和橫向（旁通）的聯繫，最後「會通」天下之書，達到司馬遷所謂的「通古今之變」及其所說的「極古今之變」。那麼，他要「周知遠近，洞察古今」則會是他修史的原則，他寫《通志》也就是如此撰就的，他主張修通史來反映歷史的流變和全貌。也因為如此，他對古來《春秋》、《史記》的撰述傳統，斷送在東漢班固寫《漢書》之後，感到非常痛心。因此從「會通」史觀出發，他對班固其人其書有不少批評，他說過：「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

<sup>40</sup> 婁曾泉，〈鄭樵〉，《中國史學家評傳》（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中冊，頁 546。婁氏以為鄭氏會通之觀點，不能僅理解為史事的綜合會纂，年代的順序貫通，還必須以儒家的觀點，解釋歷史發展及其因革變化的原因。

<sup>41</sup> 《夾漈遺稿·上宰相書》，頁 521 上。另可參吳懷祺，《鄭樵文集附鄭樵年譜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頁 37。

<sup>42</sup> 《夾漈遺稿·宰相書》，頁 521 上。

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sup>43</sup>又云：「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sup>44</sup>

除此之外，鄭樵還說：班固謂漢紹堯運，是無稽之談，且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sup>45</sup>斷代為史，在鄭樵的觀念裏，是有三個弊端：一、重複：一個皇帝有數個本紀，一個人有好幾篇傳記，〈天文志〉、〈五行志〉歷代皆有，世代記之，實不必要；二、隔絕：斷代史前後隔絕，不能連接前後時代或人物，容易使事件之因果關係或制度之沿革，變成模糊不清；三、不一致：於分裂的時代，斷代史此弊最明顯，「異則相攻，同則相與」，因而記事往往缺乏一貫性，導致是非不公，最嚴重則致史實失真，喪失原意。

這三個弊端，使人無從了解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也看不出前後因果的關聯，所以鄭樵以為斷代為史失去前後銜接會通之義，以致繁複迭出，他以為傷風敗義，莫甚於此。<sup>46</sup>所以他立意著作通史，欲恢復古有傳統，以矯正《漢書》斷代無復相因之失。是知他的會通思想使他成就了其通史鉅作《通志》，也就是說，會通思想的落實，是由《通志》來貫徹與兌現。後於鄭樵六百多年的章學誠，為此而言：

鄭樵生千載之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之言者。<sup>47</sup>

章學誠極力推崇《通志》，謂之為「別識心裁，成一家之言」。其別識心裁，在於班固《漢書》而後，斷代相沿成例，獨鄭樵「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

<sup>43</sup> 《通志略·總序》，頁 1。並參藤井清〈鄭樵の史學思想〉，《史學研究》第六集（廣島：廣島史學研究會，1951），頁 73-76。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東京：弘文堂，1949）第九章第七節〈鄭樵〉，頁 186-192。

<sup>44</sup> 《通志略·總序》，頁 2。

<sup>45</sup> 《通志略·總序》，頁 1。

<sup>46</sup> 《通志略·總序》，頁 2 有云：「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傷風敗義，莫大乎此。」，另可見陳光崇，《中國史學史論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頁 248。

<sup>47</sup> 《文史通義·申鄭》（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 136。

要刪」，<sup>48</sup>繼承馬遷之後成就《通志》，為現存中國史學史上第二部通古型紀傳體裁之史書。<sup>49</sup>劉知幾以為史記家「其體久廢」，<sup>50</sup>而鄭氏獨力撰之，章學誠以為「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sup>51</sup>又云：「《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疏陋，非也」。<sup>52</sup>雖然《通志》有缺陷，但大體則是肯定的。

章學誠本身亦主通史說，這是他支持鄭樵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主張，則非本文所欲陳述者。唯章學誠在讚揚鄭樵「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並「知作者之旨」，<sup>53</sup>故「運以別識心裁，承通史家風」成就其一家之言的同時，他進一步歸納，指出通史有「六便二長三弊」的優缺點。優點是「免重複、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六便及「具剪裁、立家法」二長，<sup>54</sup>缺點則是「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sup>55</sup>後面這三弊則是一味主張通史的鄭樵所未審悉的，值得在此提起。

鄭樵的《通志》無可避免的仍然存在若干的缺失，詳請參閱拙稿《史學三書新詮》，於茲不贅。<sup>56</sup>然就《通志》的義理宏構、別識心裁的意義而言，其瑕疵失實是微不足道的。

最後，本論要強調鄭樵運用其「會通」史觀，「會天下之書而修」，「集天下之書為一書」，以《通志》完成其偉大的宿願，尤其其中〈二十略〉對歷代禮樂制度、文字源流、天文地理、昆蟲草木都能考源辨流，辨妄糾繆，訂正異同，稽古鉤沈，做到會於一手，通於一家，確實值得推崇。吾人後學，果欲成一家之言、獨斷之

<sup>48</sup> 《文史通義·申鄭》，頁 136-137。

<sup>49</sup> 梁朝吳均（469-520）曾受敕撰有《通史》，亦通史型紀傳體之著作，唯已佚，故謂之。

<sup>50</sup> 《史通通釋·六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23。

<sup>51</sup> 《文史通義·申鄭》，頁 136-137。

<sup>52</sup> 《文史通義·釋通》，頁 131 自注。

<sup>53</sup> 《文史通義·申鄭》，頁 137。

<sup>54</sup> 《文史通義·釋通》，頁 133。

<sup>55</sup> 《文史通義·申鄭》，頁 137。

<sup>56</sup> 拙稿，《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第五章第三節「缺失論」內有詳陳，頁 379-387 及頁 162。

學，恐捨「會通」之外無可成就之書，則不能不明乎此理。

## 七、章學誠

章學誠的史學思想，都薈萃於其《文史通義》之中，此書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既是史學評論的專著，又是文學批評的傑作，然其中心論點則恐仍在論史。<sup>57</sup>由於其史學內涵，堪稱閱富。茲處因分內在外在兩條理路試析之。就外在理路而言，學誠承受遠代史書如《漢書·藝文志》、鄭樵《通志略》的影響，近受乾嘉時代學風所左右，<sup>58</sup>但他跳出當時學術風氣的藩籬，提出「明道經世」的概念。反對當時漢學「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sup>59</sup>以及宋學的「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sup>60</sup>「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sup>61</sup>他以為兩者皆不足取，都不懂史學。他認為：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他。<sup>62</sup>

這即是從「明道經世」的觀點來批評當時盛行的不良學風。因為務考索的漢學家博古而不知今；騰空言的宋學家言性天而不切於人事，達不到史學經世的目的。史學即失去存在的價值，失去生命力。章學誠處在當時這種學風，因其弊而救其偏，使學風「歸之中正」，其用心良苦。他獨樹一幟，別開生面，用其畢生力作《文

<sup>57</sup> 許凌雲，《讀史入門》（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修訂本），頁 315。

<sup>58</sup>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1973），頁 312-313。錢氏從學術史宏觀的角度，肯定章氏因受清廷編修《四庫全書》而注意分類編目之事，轉而注意到鄭樵〈校讎略〉與《漢書·藝文志》，然後才有「六經皆史」一語。至於實齋自述其學源自「浙東學派」，直從陽明而來，則錢先生以為不值得我們認真的，可謂係錢氏獨到見解，值得後學深深品味。

<sup>59</sup> 《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頁 328。

<sup>60</sup> 《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五〉，頁 368。

<sup>61</sup>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頁 53。

<sup>62</sup>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頁 53。

史通義》來繩治之。

從內在理路來說，其由《文史通義》表現出來的史學思想，亦著一「通」字。他說：

古人所欲通者，道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輔。<sup>63</sup>

說明治史的根本目的在通「道」，也就是「史以明道」的觀點。關於此點，章學誠曾以哲學的論證加以說明，他提出「道器合一」論，認為道與器的關係是「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有云：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sup>64</sup>

又云：

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為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而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夫言道矣。<sup>65</sup>

所提「六經皆器」的說法，一別於後世學者所誤以為的「六經即道」。學誠之所以提出「道器合一」的主張，頗受朱、陸、王夫之、戴東原以降的影響，尤其戴氏把「道」、「器」論納入其「氣化論」中，視所謂形而上、形而下的分別，是「氣」在變化過程中形成「體」之前與之後的差別，學誠認同於此；<sup>66</sup>二來是學誠針對當時宋學漢學的學風弊端，以為皆是「離器言道」，不著實際而提出的。針對宋學，他說：

<sup>63</sup> 《文史通義·言公中》，頁 109。

<sup>64</sup> 《文史通義·原道中》，頁 40。並參島田虔次，〈歷史的理性批判——「六經皆史」の說一〉，《歷史の哲學》（東京：岩波書店，1969），頁 135-138。

<sup>65</sup> 《文史通義·原道中》，頁 41。

<sup>66</sup> 楊志遠，〈章實齋史學思想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史研所碩士論文，1992）第二章〈章氏論道〉三，「道器合一」，頁 23-24。

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sup>67</sup>

針對漢學，他則說：

學博者長於考察，侈其富於山海，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sup>68</sup>

學誠也說：「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sup>69</sup>而學誠論道器合一，以「道因器而顯」、「道寓於器」，主要目的仍在於明道。

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形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sup>70</sup>

然而什麼是「道」？什麼是「器」呢？章學誠自解為「道」是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sup>71</sup>「所以然」是指事物之理，即「道」，是具永恆性、唯一性的。「當然」，則指事物之質，即「器」，具普遍性。他以為「器拘於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在他的觀念裏，「道」可以無所不在，但「器」受限於本身的形體，只能呈現部份的「道」。這一命題，聯繫到治史上，史事是「器」，史論為「道」，「道器合一」既是自然實在，則史事、史論的結合統一也屬當然了。

<sup>67</sup> 《文史通義·家書五》，頁 368。

<sup>68</sup> 《文史通義·原學下》，頁 48。

<sup>69</sup> 《文史通義·原學下》，頁 48。

<sup>70</sup> 《文史通義·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頁 333。

<sup>71</sup> 《文史通義·原道上》，頁 35。並參井貫軍二，〈章學誠の史學思想〉，《山下先生還曆記念東洋史論文集》，頁 5-9。

沿著這個思路，章學誠提出「即器以明道」以治史學，就是即事以言義了。<sup>72</sup>

明乎此，章學誠所要通的「道」，從治史的角度來看，算是掌握到了治史的根本宗旨。他要找的道，就是史義，也就是史家之宗旨。在《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中，章學誠表彰《春秋》家學，用意就在於此。他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sup>73</sup>可見他的「史以明道」觀念亦歸源於《春秋》，亦「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也。

## 八、結 論

由前文闡述可知史公在《史記》之中以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承敝通變三者來通達三千年史事的變化，是史公歷史認識論的基礎與核心，並為後世史家所繼承。上文依時間縱深方式，例舉唐代前期的劉知幾、後期的杜佑、北宋的司馬光、南宋的鄭樵及清代的章學誠等中國史學史上頗具代表性的史家，分別析論他們如何透過自己的傳世巨作體現「通古今之變」的思想，以致成就其專擅一方的貢獻與令名。大抵劉知幾與章學誠在史學方法論及史學批評理論、杜佑在政書體的典制史通史、司馬光在編年體通史、鄭樵則在紀傳體通史恢復《史記》光榮的傳統等不同領域，樹立風聲，揚名萬世。但他們的著作之中最基本的通變之道，實皆受惠於史公的「通古今之變」，則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強調通古今之變的獨立研究較多，縱觀的研究較少，本文的提出即基於此項見解。本文的通變思想，是不分通代斷代的，斷代固然是傳統正史的主流形式，但斷代史家欲著述有成，通變思想仍是要道要則，不可或缺。上舉劉知幾即是甲班乙馬主斷代的，但通識觀念、通變思想仍是其史學觀念中的重要成分。章學誠也強調斷代猶具「通」意，則為其獨識，為鄭樵所不及。<sup>74</sup>談通古今之變，是探索史家思想的內涵，而非其形式外在，外在形式可以多種多樣，核心內涵則前後如

<sup>72</sup> 許凌雲，〈章學誠的史學〉，《讀史入門》修訂本，頁 319。

<sup>73</sup> 《文史通義·答客問上》，頁 138。

<sup>74</sup> 柴德廣，〈試論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03。

一。本文所欲呈現者，則是從漢代迄於前清的二千年當中，看到上述六位名家的大作中無不有一貫相承的「通變」思想，縷縷不絕，可知史公的「通古今之變」思想，已成為史學的重要傳統了。

##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Lin Shi-Min\**

###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since Ssu-ma Chien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e and the society,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to write a book of one’s own,” most of the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took it to be the criterion, executed it accordingly, and nobody exceeded it. This celebrated dictum of Ssu-ma Chien became the major principle of history,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Besides exploring how Ssu-ma Chien achieved the ideal of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n his book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representative historians of all the past dynasties, such as Liu Zhiji Chi, Tu Yu, Ssu-ma Kuang, Zheng Qiao, and Zhang Xuecheng, and the gists of their books. I found that vertically from Han Dynasty to the modern times, the thought of “Tong-bian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that was derived from the same origin has extended continuously and ceaselessly. Horizontally, the historians were specialized in diverse fields such a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Ji-jhuan-ti (the style emphasized the individual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ory, the general history of Dian-jhih-ti (the style of institutions and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ystems), and the general history of Bian-nian-ti (of chronological style); based on them, the historians established their reputation, and became famous in all ages. I observed that although the items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were different, the basic principle/ method of Tong-bian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Ssu-ma Chien's ideal of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n his book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fore, we shall know that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y today, we shall not neglect this guide of thought.

**Keywords :**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ong-bian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Huei-tong (to understand thoroughly), tradition

